

庞安时学术思想及相关的自然气候因素探析^{*}

刘 舟 张卫华^{**}

(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通过对北宋医家庞安时所处时期即公元 11 世纪后半叶到 12 世纪的气候进行归类研究,结合运气学说,分析其著作《伤寒总病论》中的学术特色,探讨了当时的气候环境因素可能对庞安时学术思想的影响。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庞安时所处时代气候转寒,是中国古代四个寒冷期中的一个时期,而庞安时《伤寒总病论》中首倡的寒毒病因学说、针对温毒重用寒凉的表里双解治法以及用圣散子方以辛温散毒等学术思想,均与当时自然气候因素相关。

关键词:庞安时;气候;学术思想;伤寒学派

中图分类号:R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71(2014)06-0067-03

庞安时,北宋时期著名伤寒学家(1042-1099 年),字安常,蕲水(今湖北省浠水县)人。他少时即喜好医方,多年潜心研究《伤寒论》,与北宋文豪苏东坡交谊深厚,苏氏称赞他“精于伤寒妙得长沙遗旨”。他的著作有《伤寒总病论》《难经辨》《本草拾遗》等,现仅存前者,其余均已亡佚。庞安时治伤寒多从病因、发病入手,并结合气候、体质等进行探讨,屡有发挥,他的学术思想对后世伤寒学派、河间学派和温病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均有较大的影响。

运气学说强调气候的异常变化往往会导致某种疾病的发生,它符合“气候—物候—病候”的发病模式。生态医学则更加强调:疾病的发生不是病源的单因素作用,而是外在环境和内部机能的综合效应。生存条件的气候、环境、时间、物候、地域、饮食五味、社会等因素的变动,内在环境中人的情志、体质、阴阳、气血等的异常,两方面的综合变动才造成疾病的产生,它符合“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生态医学模式”^[1]。而且,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从来都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主动的,所以针对某种疾病,医家们会创立某种学说或形成新的用药规律,由此就会产生新的医学流派。本文主要根据中国古代 11 世纪后半叶到 12 世纪的气候特点,对庞安时的学术思想进行

深入探讨。

1 庞安时所处时代的气候背景

庞安时所处的公元 11 世纪后半叶,正是气候转寒加剧的时期。竺可桢报告中提到:历史上有两个阶段,即宋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的气候寒暖变化远比其他时期高。中国气候在唐代经历了温暖时期后,从公元 11 世纪初期气温开始变冷。11 世纪初,梅花就不能在华北生存了,北宋诗人苏轼(公元 1037-1101 年)在他的诗中写到“关中幸无梅,赖汝充鼎和”,即哀叹梅在关中消失。同时代的王安石亦嘲笑北方人常误认梅为杏,他的咏红梅诗有“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的名句。11 世纪开始的寒冷,持续到 12 世纪气温加剧转寒。又以流行于华南和中国西南部的荔枝为例:唐朝时,成都尚能种植荔枝。到了北宋苏轼的时候,荔枝只能生于其家乡眉山(成都以南 60 公里)、甚或眉山以南 60 公里的乐山,至南宋时期,荔枝只能长于乐山以南 60 公里的宜宾、泸州川南地区了。福州历史上一直是盛产荔枝的地方,但是 1000 多年以来,福州的荔枝曾遭到两次全部死亡:一次在公元 1110 年,另一次在公元 1178 年,均在 12 世纪。无独有偶,公元 1111 年,史书上第一次记载江苏、浙江之间拥有 2250 平方公里面积的太湖,不但全部结冰,而且冰的坚实足可以通车。此外,苏州附近

^{*}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2SJD630042)

^{**} 通讯作者:张卫华(1979-),男,宁夏中卫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医治法与方剂配伍应用研究。

的南运河也在冬天结冰^[2]。从这些物候常识,就可见唐宋两朝温寒的不同。

2 气候因素对庞安时学术思想的影响

2.1 首倡寒毒病因 由于北宋气候整体寒冷,所以庞氏开卷即首论寒毒。他在《伤寒总病论·序论》中写道:“素问云:冬三月是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是以严寒冬令,为杀厉之气也。故君子善知摄生,当严寒之时,周密居室而不犯寒”^[3]。他进一步分析:“当阳气闭藏,反扰动之,令郁发腠理,津液强渍,为寒所搏,肤腠反密,寒毒与营卫相浑,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成病矣”^[3]。庞氏分析伤寒从病因入手,指明人体发病的病因为“寒毒”。而感受寒毒之后,发病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人体的正气,即谓之“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成病。”同时,他又进一步分析即使是发病者,由于发病季节的不同,所表现证候又各不相同。他说:“其即时成病者,头痛身疼,肌肤热而恶寒,名曰伤寒。其不即时成病,则寒毒藏于肌肤之间,至春夏阳气发生,则寒毒与阳气相搏于营卫之间,其患与冬时即病候无异。因春温气而变,名曰温病也;因夏暑气而变,名曰热病也;因八节虚风而变,名曰中风也;因暑湿而变,名曰湿病也;因气运风热相搏而变,名曰风湿也”^[3]。

庞氏这段话强调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强调一切外感热病共同病因是“寒毒”。虽然寒毒临证表现有温热、中风、暑湿等的不同,但病因的共性重在“毒”。明确这一病因,相应的治法自然要以“解毒”为主;第二,强调发病与四时气候、人体阳气盛衰有关。由于寒毒伤人阳气,所以发病与否决定于人体阳气。根据季节气候的不同,冬时即发为伤寒,春时诱发为温病。这对后世伏气温病的形成颇有影响。总而言之,庞安时认为寒邪致病是比较广泛的,这与当时气候严寒有一定的关系。

2.2 首辨温病与伤寒 在宋之前,温病归于伤寒范畴,治疗也就没有独立出来。而庞氏明确指出温病分两种:一种是一般温病,属广义伤寒的一种,其发病是冬时感受寒毒,到春分至夏至前发病;一种是天行温病,是感受“疫气”、“乖气”或称“异气”而成的,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的特点。而

且,他在《伤寒总病论·天行温病论》中进一步明确温病因兼感的四时六淫邪气不同,有不同的病名。人体感受异气之后,倘若遇风热而为病即是风温;遇湿气而为病,则为湿温;遇寒邪而为病变成温疟;遇热邪而为病,变成温毒。其中温毒为病最危重。

最有临床价值的则是他形象地概括了温毒五大证,并确立了辛温散毒、清热解毒、攻下泄毒等治疗原则。以他针对温毒创设的柴胡地黄汤为例,全方集辛温散毒之柴胡、桂枝,清热解毒之石膏、大青,攻下泄毒之芒硝等诸药为一体,以大剂量的清热解毒佐以少量的辛温之品以散毒。尤其突出的是方中石膏重用至四两。庞氏的用方较多采用了表里双解,宣通表里郁热,辛温复辛凉,发散中寓有清热,寒热并进以解毒等治法,实为河间学派之滥觞。

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北宋庞安时生活在 11 世纪后半叶到 12 世纪初,金时期的刘完素生活在 12 世纪,二者皆生活在寒冷的时期,金时代气候应较北宋更加寒冷。那么,为何两人都会不约而同地选用辛温复辛凉的表里双解治疗疫病?其实,这正是由于寒冷的气候环境导致的。人体感受寒邪,由于寒性收引,腠理闭塞,阳气不能宣通而怫郁,最终形成热郁。倘若寒邪越重,腠理越闭塞,体内郁热也会越严重。因此,庞刘两人都选择了辛温复辛凉以表里双解,这与后世温病学派选用的辛凉解表轻剂其制方配伍思想还是有所不同的。

2.3 首载圣散子方辛温散寒 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卷六中首次收录了圣散子方,并全文附上其好友苏东坡为之作的序。圣散子方的组成有:高良姜、白术、白芍、藁本、白茯苓、柴胡、麻黄、防风、泽泻、猪苓、藿香、细辛、吴茱萸、独活、苍术、枳壳、厚朴、半夏、附子、石菖蒲、甘草、草豆蔻,共计 22 味药,多为辛燥之品。苏东坡在序中认为该方可以治疗一切伤寒,曰:“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阴阳二感,或男女相易,状至危笃,连饮数剂,则汗出气通,饮食渐进,神宇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瘥……若时疫流行,不问老少良贱,各饮一盞,则时气不入其门。平居无病,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快美,百疾不生,真济世卫家之宝也”^[3]。苏东坡对

圣散子极为推崇,且称:“谪居黄州,连岁大疫,所全活至不可数”^[3]。由于大文豪苏轼的称赞,加之名医庞氏首次收载入医书当中,因此使圣散子方广为流传,盛极一时。然而,明代以降,圣散子方的使用屡出意外。如明代俞弁曾记述过医者运用此方治疗疫病的可怕后果,“弘治癸丑年,吴中疫疔大作,吴邑令孙磐,令医人修合圣散子遍施街衢,并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无一生”^[4]。有鉴于此,清代以后,这个方基本就被人遗弃了。

圣散子方由盛极而转衰,要分析个中缘由就必须联系当时的气候运气特点。该方最初收录在庞氏《伤寒总病论·卷四》“时行寒疫论”篇章中,可见该方有明确的适应症——寒疫。那么,为什么在当时抗击疫病中活人无数的济世良方,换一个时空就成为杀人无数的刽子手了呢?清代名医陆懋修根据运气学说中的“六气大司天”理论,分析了圣散子使用的运气背景。他在《世补斋医书·大司天三元甲子考》中云:“公谪居黄州,尚在六十三甲子,湿土运中,方必大效。至五十岁后,又值六十四甲子,相火之运,故至辛未而即有被害者矣”^[5]。也就是说苏轼用圣散子方正值第 63 甲子太阴湿土在泉,结合北宋寒冷的气候特点,再分析全方辛热燥烈的药性特点,我们不难推断:苏轼、庞氏所处地域流行的应是寒湿疫病。而随着古代气候寒暖的变迁,明清时期运气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相对应的疫病性质当然发生了性质的转变,此方也就自然而然地被世人弃用了。

3 讨论

通过对庞安时所处年代的气候特点进行分析,从公元 11 世纪后半叶到 12 世纪初的气候加剧

转寒,我们发现庞安时倡导的“寒毒”病因学说与当时的气候背景是吻合的;此外,他重视温毒,其制方配伍中确立的辛温散毒、清热解毒、攻下泄毒等治疗原则,辛温复辛凉、表里双解的配伍用药原则,与《素问·热论》:“人之伤于寒者,则为热病”的理论一致。因而和寒冷的气候仍然有一定的相关性;他收录了集辛温燥热诸药的圣散子方,以治疗寒湿疫病。这类疫病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爆发的频率可能更高,或者真如苏轼所言“连岁大疫”。同时,宋代的气候特点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方书用药普遍温燥。以上论述,充分说明自然气候因素对庞安时的学术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探讨至此,对于新形势下,如何能更好地在大生态医学模式下研究医家学术思想、用药规律,如何结合运气的大环境更好地研究和建立中医疾病气候评估模式,并制定相应预防治疗对策,值得我们不断思考和探索。

参考文献

[1] 陶功定,冯前进,李俊莲,等从《黄帝内经》生态医学思想浅论生态病因学[J].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6(8):649.

[2] 竺可桢. 中国古代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 考古学报,1972,(1):21-66.

[3] 宋·庞安时. 伤寒总病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1-2,91-92.

[4] 伊广谦. 扑朔迷离的《圣散子方》[J]. 江西中医药,2006,37(278):57-58.

[5] 清·陆懋修. 陆懋修医学全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52.

(收稿日期:2014-09-21 编辑:张喜德)

欢迎订阅 欢迎投稿 欢迎刊登广告

<http://tgxt.sntcm.edu.cn>